



[美] 何天爵 著
卢彦名 译

真实的中国问题

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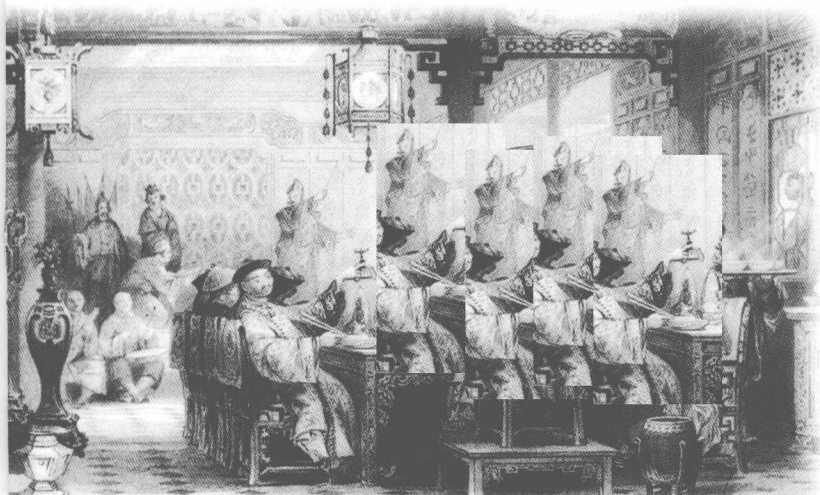
南京出版社



[美] 何天爵 著
卢彦名 译

真实的中国问题

The real Chinese question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实的中国问题/(美)何天爵著;卢彦名译. 南京:
南京出版社,2009.4

(“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

ISBN 978-7-80718-476-8

I. 真… II. ①何… ②卢… III. 游记—作品集—
美国—近代 IV.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4182号

丛 书 名:“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

书 名:真实的中国问题

著 者:何天爵

译 者:卢彦名

出版(发行):南京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成贤街43号3号楼 邮编:210018

网 址:<http://www.njpbs.com> <http://www.njpbs.net>

联系电话:025-83283817(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webmaster@njpbs.com

责任编辑:鲍咏梅

装帧设计:郭春明

印 刷: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965×1270 毫米 1/32

印 张:5.75

字 数:143千

版 次: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18-476-8

定 价:16.00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真实的中国问题

何天爵 (Chester Holcombe) 著



本书作者何天爵 (Chester Holcombe) 多年担任
美国驻华使馆翻译、参赞及代办, 著有《中国人本色》
(*The Real Chinaman*) 等书。

出版者的话

在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上叶众多来华的西方作家中，我们选取了一些作品，结集而成这套“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他们之中有西方报刊社派驻中国的记者，有著名的汉学家，还有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交官，或清廷所雇用的外国官员、教习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他们基本上以比较客观的笔调，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等方面作出了写实的描绘。中国近代的落后和衰败，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更多地表现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而这些著述恰恰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民族的自我认识。

不可避免的是，在那些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记录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基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这些西方人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认识有其真实的一面，但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在主观上不可能不受其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其所记所述依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我们之所以忠实地保留了原样，其宗旨是为了展现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怎样的形象。我们相信，阅读这类图书的读者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水平对事实加以针对性地鉴别和分析。

译者序

毫无疑问,20世纪初年的中国在西方人的叙事中主要是以撒旦的形象出现。1900年,英国《泰晤士报》连篇累牍地描绘了义和团恐怖残酷的“围困”与八国联军的“解放”。义和团事件过去了,但“黄祸”的恐慌在西方并没有消失。世纪初年的西方人在谈及东方时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妖魔化论调。就在这一片反华的浊浪之中,我们忽然听见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这就是曾长期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的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代表当时已经完全失语的中国人发出的抗议。

“缺席者永远理屈(*Les absens ont toujours tort*)”。何天爵引用这句法国名言来说明中国人受到西方民众普遍误解的原因。作为长老会传教士和美国外交官,何天爵多年游历中国,考察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他为中国的尊严而辩护,并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尖锐地指出西方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对使用暴力丧失了理性。他还对某些西方民众提出了忠告:“在一个人随波逐流地谴责中国人之前,如果他选择公平与公正,他应当采用明智的建议:‘请你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何天爵于1869年来华,在北京负责管理教会学校,1871年他辞去教会职务,先后任美国驻华使馆翻译、头等参赞、署理公使等职。曾参与起草1880年关于华人移居美国的条约,还参与了1882年美国 and 朝鲜签订条约的工作。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期间他曾接待陪同,在处理美国侨民在华经济纠纷和教案方面不遗余力。1885年何天爵回到美国。可以说,何天爵对于中国问题的全面深刻认识是少有人能与之比拟的。

1895年,就在中国人输掉中日甲午战争的这一年,何天爵曾出版《中国人本色》(*The Real Chinaman*)一书,在西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这本《真实的中国问题》诞生的时代背景则更为特殊。正如他在本书前言中所描绘：“当一个巨大的民族突然起义并狂热地挑战所有西方国家的时候，面对如此可怕的灾难，连西方国家中最睿智和最消息灵通的人们都在震惊中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

人们总是通过强调共同性来表达友好，通过强调差异性来表示敌对。“黄祸”论的排斥性思维正是基于以种族主义为背景的绝对敌我观。在某些西方人的眼里，中国愚昧落后、道德败坏，要依靠欧洲的文明才能获得教化，但他们又担心随着中国人的崛起，将会挑战白人的地位，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念都是出于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深处对东方的恐惧。西方人把视线移向东方的目的是想克服他们自身的异化，用想象的他者来反映自我。他们在将中国等同于野蛮的同时，也将西方等同于文明。何天爵所猛烈抨击的正是这种思维定式。他在书中多次批评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和帝国主义行径（尤其是罪恶的鸦片贸易）。他愤怒地说道：“现代的万里长城主要是由鸦片箱构筑起来的。”“如果自诩为一种更高文明的西方列强，出于自私的政策而不愿对目前正在震惊世界的这些不必要的和不可挽回的屠杀、苦难和毁坏负责，那将是人性最大的悲哀。”

何天爵在本书中客观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各主要阶层的状况。他指出，中国有神秘主义者，但中国并不神秘。简单而自然的生活是中国人的最高追求。何天爵由此评论道：“中国的人民大众是平和、勤劳、坚韧和习惯于忍耐的。但是，他们既不迟钝也不昏聩。对他们来说，一次突然的冲动必然有其长期存在的根源。观念和情绪缓慢地渗透进他们的意识中，他们隐忍着积聚力量，直到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以席卷一切的行动爆发出来。”

时至今日，“黄祸”论依然是萦绕于西方社会的幽灵。随着中国的复兴，作为“黄祸”论的新形式，“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时有听闻。此时我们回顾一百年前何天爵说过的话就更多了一份感慨：

中国人有充分的能力管理自己并规划自己的未来。……他们也许不太容易接受新观念,但是一旦接受,这些观念将毫不动摇并被用于更好的目的。他们也许并不会按照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观念和方式来塑造一切。但是,谁又能保证后者的观念和方式就是所有民族在一切条件下所能拥有的最好的观念和方式?中国人的整个历史显示出了他们的能力、实力和气魄。他们将会独立自主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尽管缓慢,但却坚定而高效。在这种情况下,外人友善的指导远胜过充满敌意的控制和命令。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何天爵的思想同样可以为世人所借鉴。唯有打破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式,才会有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也才能摆脱“西方/非西方”的冲突范式,最终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与共同进步。

是为序。

2009年2月9日

前 言

有一条厚道的生活规则，它让我们从最好的方面看待每个人。比较明智和保险的做法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彻底地研究每一个个体，然后公平地处理良好的性格特征和不良的性格特征，把处理的结果作为判断和行动的基础。同样的规则可以安全无虞地扩展，对于一切国家和民族都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用于别的目的，这条规则将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并矫正无知的偏见和最普遍的错误。

“缺席者永远理屈(*Les absents ont toujours tort*)”。这句法国名言很有说服力，并且有广泛的适用范围。很少有人公正地讲述缺席者的故事，导致特定行为的动机和原因很少大白于天下。由于误传和疏忽，人们的看法总是不利于他们。这一通常的实践原则不仅适用于人类家族的个体成员，也同样适用于国家和种族。

中国人——不管这一术语是用来指称个人、民族还是国家政府——在其中受害不浅。他们在过去就是“缺席者”。我们只需要瞥一眼每天的通讯专栏，或者阅读一些更为严肃的期刊文章，就会意识到那句法国名言放在他们身上是多么贴切。任何说法，任何故事，不管有多么语无伦次、荒诞怪异或自相矛盾，只要它们是在说中国，就会得到普遍接受。如果把《格列佛游记》、童话和《胡巴德大妈的狗》(*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other Hubbard's Dog*, 英国一首家喻户晓的儿歌。——译者注)拿来与当下关于中国的故事相比较，它们就都成了最平淡无奇和最单调乏味的平常散文。

他们不仅仅是在用以消磨时间的故事和小说描写中才受到损害。在最为重要的事务上，在那些决定战争或和平的事务上，在那些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事务上，中国人都是“缺席者”，根据他们子虚乌有的

说法或者根据他们的敌人们的说法,他们被判定为有罪。因为至少直到最近,中国人还保持着沉默。他们无法或者不敢在西方世界的民众面前为自己辩护或坚持己见。他们认识不到这群人拥有控制和指导政府行动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还能操纵政府。因此,一切都不利于他们。

举例说来,如果把这些事实准确清晰地告诉公正慷慨的英国民众;如果他们知道中国人受到误解的原因;如果他们熟悉了帝国政府的观点、抗议、呼吁和强烈的反对声;如果他们理解了派遣到中国去的英国士兵和英国战舰的无耻企图——如果他们能看到所有这些,他们是不可能允许他们的政府继续从事鸦片贸易并对中国做出如此残酷的错事来的。然而,中国是“缺席者”。她向公使们发出呼吁,他们对呼吁和抗议置之不理。当需要向更广泛的听众申诉时,她却保持着沉默;她本应当向君主背后更高的力量发出呼吁。

中国的政治家们喜欢说“中国是一条沉睡的巨龙”。最近的中国也许并不是这样,而是一条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和困难的巨龙。她长时间处于现代生活的急速旋转之外,但是现在正逐渐卷入其中,她还没有适应形势或者意识到形势的需要。她只能以一种世界无法理解的语言发出抱怨。

已经有太多的作品从单纯的外人立场出发描写中国。书架上的书(特别是英文书)全都在详细精巧地讲述中国人需要什么、中国人想要什么以及对中国来说什么是最佳的,其唯一的目的却是增进英国的商业利益并且阻碍俄国人以及其他列强的图谋。但是对于中国的真正需求,知识界却明显地保持了沉默。不用说,那些书是为了替某种外交政策辩护或者与之合作而写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它们中很少有公正和公平的。它们的写作目的既不是为了描绘帝国民众的所感所欲,也不是为了描绘他们说了些什么。它们既不从本地人的立场上也不从外国人的立场上对任何问题得出宽泛和一般的观点。相反,一切都集中到一个单一的观点以及外国人的利益和好处上来了。

正如当下的形势所显示,最为不幸的结果发生了。一场风暴、一

场火山喷发、一场地震(或者可以用其他可怕的名称来称呼)正在中华帝国突然爆发为可怕的行动,伴随着无可名状的恐怖与痛苦。成千上万无辜无助的男女老幼遭到了杀戮。已经有数以亿计的金钱在野蛮的暴行和镇压中被耗费,没有人能看到终结。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正命悬一线。

在这个交流迅捷和信息普及的年代里,当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一切的时候;当世界上的每一处角落和缝隙都已经受到入侵和开发的时候;当书刊和报纸的洪流已经遍布世界的时候;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再需要猜测,人民已经将目光投向火星和其他星球的时候——就在这样的时代中,当一个巨大的民族突然起义并狂热地挑战所有西方国家的时候,面对如此可怕的灾难,西方国家中最睿智和最消息灵通的人们在震惊中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然而,只要对过去六十年中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和变化有一些公正的认识,只要对中国的历史稍加熟悉,外国人就不会对事件爆发的原因感到惊愕,只会对它为何姗姗来迟感到惊愕。并且,如果他们早一点得到这些公正的信息,事件的爆发或许已经从根源上被制止了。

本书的目的是向富有思想和公正思考的公众提供一些相关的历史片断,并且试图解释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某些势力和影响力,以便让读者有机会认识到,某些事件和西方国家的某些政策路线对中国人造成的影响有多么的大。在此过程中,本书也许能为判断和决定真实的中国问题提供一些较为明智和较为可靠的依据。

本书不为任何人(尤其是中国人)辩白和辩护。它陈述的是事实,其中一些虽然是直白和不留情面的,但是应该既不夸大也不隐瞒地说出来。它并不是为中国呼吁,而是为公平竞争呼吁。

何天爵

1900年9月15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一些严重的错误	1
第二章 中国人的性格	14
第三章 中国文人	28
第四章 中国社会	41
第五章 中国的陆军和海军	52
第六章 传教士	66
第七章 在中国的外交使团	79
第八章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	95
第九章 鸦 片	109
第十章 外来侵略	126
第十一章 瓜分中国	138
第十二章 中国的改革	151

第一章

一些严重的错误

无知总是麻烦之源，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评论。基于可怜的知识 and 大量的想象而得出的关于民族或种族的观点和意见在小说中或许是无害的，但当它们作为交流和实际关系的基础时就会变得危险了。相互的误判、不公正与敌意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称呼一个中国人为野蛮人要比理解他来得容易。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人眼睛的形状和位置都很怪异，他们用筷子吃饭，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在裤子外面穿衬衣，这些都被作为使用无礼措辞的充足依据。然而，中国人既不能塑造又无法放置自己的眼睛，而我们自己的祖先也像他们一样束发和穿着。上面提到的相关服装打扮也与道德、智力或宗教无关。因此这些气量狭小的辱骂很大程度上是无知的结果。

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对中国人的误解、对中国人心态的错误看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人的错误判断和错误行为，是很大一部分中西摩擦和冲突的根源。有些人不承认中国人拥有可以鼓舞和主导世界其余部分的精神、动机和感觉。中国人往往不被赋予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待遇。他们不像其他人一样能得到同等的忍让和体谅。基于纯粹自私原则行动的各国政府，反对并且多次以武力压制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反抗行为。某些人和某些政府对于最终后果漠不关心，只顾他们的当下利益。但是民众更愿意公正地思考问题，无意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中国。不仅如此，他们还甚为明智地接受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对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伤害不可能使任何其他个人或民族持久地获利。

误会应当消除，错误的印象应当纠正，真相应当大白，中国政府和

民众应当得到更好的理解,这些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如果继续沉溺于无知,其代价太过高昂,也未免太不明智。双方有许多共同的联系之处和共同利益,从中可以产生正确的相互理解。相比军舰和炸药,公正的判断和越来越多的尊重更加有助于推进各种正当形式的交流和商贸。西方世界可以通过真诚地理解中国来最好地帮助中国理解西方世界。

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帝国正处于长期的暴政和无政府状态之中,那他就错了。虽然有因为地方官员的无能和残暴以及民众的迷信或无知而偶然引起的地方动乱和起义,但是帝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宁静而平和的。它有众多的城镇和村庄,它们获准拥有很大程度的自治,并且管理得井井有条。中国人既非在可见的重负之下呻吟,也并非在与不受欢迎的暴政斗争。不管政府制度可能有何种缺陷,每个中国人自身都对这些缺陷负责。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事实,因而很少反对制度,尽管他们有时会奋起抗议他们所认为的行政过程中的滥用权力或玩忽职守。在这种制度存在的漫长岁月中,或者是中国人已经按照制度塑造了自身,或者制度本身就是中国人性格的自然结果。不管是哪种情况,政府的能力获得了中国人完全的赞许。

实际上,中国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少受到控制。只要他们交税并且不违反道德法规的要求,他们就不会受到当局的打扰。在美国和欧洲司空见惯的千百种官方的检查、干涉和勒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其中的一些或许被不明智地引入了,但是中国人从未受到它们的支配、困扰或折磨。中国人忠于法律,喜爱良好的秩序,这是出于他们的天性和教育。孔子的教义以及明君康熙(Kang Hsi)的圣谕在全国各地被传授给每一个臣民,这些文献具有巨大的和重要的影响。关于中国人守法性格的证据,我们可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尽管面对强烈而普遍的仇外情绪,外国人多年来还是可以不受保护地独自在帝国的每一个地区旅行,并且几乎总能得到礼貌、文明和友善的对待。如果中国人的仇恨相应地存在于美国,那么他们

又能在多长时间内和何种程度上谨慎而安全地漫步在我们的大城市和农村社区呢？另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事实补充了这方面的证据。移民到这个国家的中国人几乎清一色地属于其民众中的最低阶层，他们在故乡通常被描绘为“半渔民半海盗”。然而，对美国城市的刑事记录和警方记录仔细查看显示，妨害治安的中国人的比例比其他任何我们从中所能看到的外来民族都更小——相对于这个种族居民的总人数来讲比重较小。

中国人并非昏昏欲睡、软弱无能和冷漠无情。但是，他们或许过分坚持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待一切事物，以自己的方式研究它们，并且坚持自己做出决定，不管这些事物对他们是否有价值。他们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在千百年前就已经确立并且充分调整和具体化了。我们的这些制度几乎每天都在改变和发展。或许，当他们看到我们如此迅速地放弃这些制度并代之以未曾尝试过的新制度，我们就不能期望他们毫不犹豫地主动接受我们的制度。他们的生活模式也比我们的生活模式更加简单与平和。他们憎恶被西方人称为生活的那种无休无止的混乱状态。换言之，如果忽然被投入这种状态之中，他们就会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对它进行强烈批评。

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其他方面却很容易认同西方人的理念和方式的优越性。他们极为憎恶任何对他们指手画脚的企图。但他们却很乐于在渴望建议的时候询问建议，只是保留了根据自身的观点和判断来消化、使用、改造和拒绝建议的权利。他们不会允许外国人控制或插手他们的事务。不管要做什么，他们都决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亲自来做。

就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大多数在帝国拥有利益的外国人正为着相反的目的而工作着。持续的摩擦和大量的愤怒情绪就是其结果。中国人相信，外国人正在为了外国的利益和权益而寻求对帝国的考察、开发和重建。他们决不会赞同任何此类行动，并且在今后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它。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

民众都必须反躬自问，在外国人的这种持续而公开推行的战略之下，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这样就能理解中国人的情绪了。毫无疑问，很大一部分外国人的动机就是如此。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公认。想从被剥削的种族那里获得任何对这一动机的认同都是不通情理的，也不能期望他们对这一图谋有任何超乎寻常的适应能力。当一定量的开拓和发展完成之时，当中国人已经能够从外国人的口袋和金库里将这些成果转移到他们自己的腰包里时，就会有人幼稚而荒谬地抱怨“中国的开放主要使中国人获益”。为什么不应该是这样呢？他们的计划引起这些非其所愿的和始料未及的结果，因此明智的人们发出了呼吁，并在报纸、杂志和书籍中专门批评了他们自己的政府。

中国人不是小孩子，这样看待他们或对待他们都是错误的。很少有哪种行动方针比凭借欺骗诡计或者以任何方式利用他人的无知来达到目的的图谋更能迅速挑起强烈的敌意。只需要引证少量的历史就可以展现出这一点。大约二十五年前，许多渴望着在中国建设铁路的外国商人决定修建一条上海至吴淞长十二英里的示范铁路。他们相信，如果中国官员和中国民众有机会看看和检验一下这种交通方式的价值，他们的反对声就会消失。他们的目的是值得称赞的，而他们的手段却是不明智的。在组织起一家公司并筹得了必需的资金之后，他们向中国当局申请允许在被提议的线路上修建一条马拉的铁路。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大量的通信之后，当局发出了许可，双方都特别清楚地表示只可以使用畜力，蒸汽的使用被明确禁止。然而，计划推行者们的目的是修建一条窄轨蒸汽铁路，他们照此进行，丝毫不顾之前的信誓旦旦。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没有哪个中国官员和帝国臣民会从建筑过程中的怪异之处觉察出他们正在玩的把戏。只有当看见蒸汽机车的时候，他们才能分辨出它和马匹的区别并且发现他们受到了哄骗。握有权益的外国人相信，他们的劝说能力以及既成事实对官方意见的强制力可以确保铁路的建设。他们显然对中国人的脾气所知甚少。

预期线路的勘定激怒了一群民众,后者迅速被弹压,当局在建设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给予多次热忱的帮助。但是,当线路完工和机车——悄悄地零散走私进入上海并被秘密地组装起来——现身的时候,一场风暴爆发了。中国的官员们和北京的帝国政府发出了一次又一次愤怒的抗议。由于修建这条线路的申请以及相应的结果是通过官方途径进行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激烈。至少有两位总领事参与了欺骗,在中国人的眼中,他们的政府通过这些人也参与了欺骗。

中国当局格外防微杜渐,以至于就像在别处也会做的那样打算拆掉这条铁路。一切理所应当的行动都被采取了。如果可能的话,大众会比官员们更加激动,当难以弹压民众的时候,民众就组织起来秘密破坏桥梁和路基部分。当这些地方的所有地点都得到有效保卫的时候,受误导但爱国的中国人就投身于滚滚行进中的火车车轮之下,希望通过自杀来唤起这个民族对西方人诡计和暴行的更高涨的愤慨。

与此同时,除了英国国民之外,所有预见到风暴的外国人都已经悄悄地出售了他们的权益并从错误设计的投机活动中抽身撤退。因而,商务外交管理就留给了英国政府。在几个月恼怒的讨论之后,英国首相最终被迫命令停止这条铁路的运行,因为它对于在上海的所有外国权益正构成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在进一步的争论之后,对以其他方式解决问题失去希望的中国政府,慷慨地提供了一笔款项用于购买这条铁路,得到了英国当局的接受。后者要求以重开铁路并运行一年为条件,中国人如约执行。但就在到期的那一天,拆毁工作立刻开始了。路基、设备和全部车辆的每一个部分都被拆除并装船运往台湾岛,在那里扔到海滩上,任其毁灭。

中国当局以这种非常得体 and 开销不菲的方式表现了他们对自己像小孩子一样被戏弄并成为诡计牺牲品的强烈愤慨。那些终身生活在中国却什么都没学到的外国人,所采取的这种设计拙劣的行动方针,使铁路延迟了许多年才被引进帝国。

通过类似的批准外国商业行为的条约,加进了一些约束条件。许